因漕运而兴 因战祸而衰

近代江西瓷商在天津

吉朋辉

近代以来,天津是经销江西瓷的大埠。所谓江西瓷,即江西景德镇所产瓷器,分为美术瓷、陈设瓷和日用瓷,其中日用瓷占90%以上。经营江西瓷者被称为“江西瓷商”,他们的经营模式基本上是江西办货、天津销售,除了供应天津本地外,还转运河北、山西、河南、山东、东三省等地。天津的江西瓷商分为江西帮和北方帮。江西帮由江西人组成,店铺主要集中在估衣街、锅店街。北方帮以河北、天津人为主,兴起于清末,最初由江西帮瓷器店学徒出身者出资或经营,店铺主要集中在河北大街。本文主要介绍近代以来天津的江西帮瓷商。

江西人到天津经营瓷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1931年《社会月刊(天津)》复刊号刊载的《天津市磁(瓷)器业调查》一文记载:“本业在明代即有江西粮船帮客人联合之同业团体,名为江西昭武磁帮公所。”可见江西帮瓷商早在明代就来到天津,且建起了同业组织。他们以搭载江西漕粮船只的方式运输货品,所以被称为“粮船帮客人”。“昭武”是江西抚州的别称,抚州帮是江西商帮的典型代表。可见明代在天津经营瓷业的江西人主要是抚州帮。

明清易代之际的战乱阻断了南北商贸往来,而清初恢复漕运后,清政府严格限制漕船载运粮食以外的其他货物,因此江西帮瓷商在天津的经营活动归于沉寂。到了乾隆年间,清政府开始对漕船带货持宽容态度,于是经营瓷器业和书业的江西商人随着漕船大规模北上,在京津地区崛起了。他们和江西漕粮帮一起,在天津万寿宫创建了江西会馆。道光朝后,随着漕粮海运的逐步开展,清政府对漕船载货更加宽容。据清代《漕运全书》记载,道光年间海运漕船“每船准其八成载米,二成载货……如货物到津售卖不完,或另贩天津货物转至奉天,一律免税”。

道光至光绪年间是江西帮瓷商在天津最为兴旺的时期。高荣彬、程馨山《天津陶瓷业史略》记载,此时“由于来货不易,所以江西帮几家瓷庄加大利润出售。又因为都是同乡同帮,对外采取一致口径,赚钱很多。自江西帮开业到1910年的期间,是这几家独占市场最赚钱的时期,也是江西帮在历史上兴隆发达的黄金时代”。1911年天津商会组织商户为1910年冬赈捐款,参加捐款的瓷商九家中有八家是江西帮瓷商,足可说明他们在天津瓷业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另外,清末天津商会成立后,商会的瓷行董事都是江西籍瓷商。

从光绪年间起,随着漕运停止和近代交通发展,江西瓷器运往天津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海运逐渐改用轮船,通常从景德镇运至九江,再装轮船经长江运至上海,最后转船运抵天津;另一方面,1912年津浦铁路开通,江西瓷器可由民船运至浦口,再通过火车运达天津,此即所谓“航车运津”。到了1931年,因铁路运行不畅且运费高昂,运输又重新回归以轮船为主。不管是哪种方式,都使江西瓷业的捐税大幅度增加。再加上洋瓷的冲击,天津的江西瓷商数量急剧减少。根据1929年《工商半月刊》的调查,在1923年之前,天津经营江西瓷器者有七十余家,而到了1929年已经倒闭了五十余家。剩余的十余家中江西瓷商中,江西帮瓷商只有瑞昌祥、修盛魁、豫盛公司、源泰、景华泰五家。

尽管如此,江西瓷在天津的瓷器市场上仍保有重要地位。1931年《天津市磁(瓷)器业调查》显示,当时天津共有瓷器商店121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资本仅数十至百元的小型缸碗店,“以江西帮各磁(瓷)庄为较大”,且“江西帮之商店,均售江西粗细磁(瓷)器,及附售上海运来之凉席等货,且多聚估衣街、锅店街一带,均系大字号”,显示出江西帮瓷商在企业规模和资本实力上的优势。此时天津的瓷器市场上产品种类繁多,有江西瓷、日本瓷、西洋瓷、唐山瓷、磁州彭城瓷、宜兴瓷,但是全年瓷器销售总量中,江西瓷仍占百分之五十二,位居各类瓷器之首,远超唐山瓷的百分之二十和日本瓷的百分之十。其中的江西帮瓷商,仍是源泰、景华泰、瑞昌祥、修盛魁、豫盛公司五家。这五家商号的资本额、年流水额算是比较大的,体现出江西帮瓷商的顽强生命力。

北方帮瓷商除了主要运销江西瓷器外,并附售唐山粗瓷器及东洋细瓷。河北冀县人多在河北大街一带设立店铺,天津人所设店铺则散布于市内各处。他们经营方式灵活,更贴近普通市民的消费需求。随着江西瓷成本上升、供应不稳,北方帮商人迅速调整策略,积极引入价格更具竞争力的唐山瓷和东洋瓷,在市场变动中站稳脚跟。到了1936年,天津瓷器市场已形成江西瓷、唐山瓷与东洋瓷三足鼎立的局面。在这个过程中,江西帮瓷商老字号逐一歇业或者倒闭,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只剩下豫盛公司一家了。

近代,几乎所有的江西瓷店都成立于民国前,以清光绪朝后期最为集中。

1900年,万寿宫江西会馆毁于战火后,在津江西帮瓷商集资重修,主持重修的瓷商字号都是抚州帮成员。

抗日战争期间,交通中断,江西瓷器运津渠道断绝长达六年。内战爆发后,由于交通运输不畅,江西瓷在天津的市场最终未能恢复,江西帮瓷商也就此彻底沉寂下去。

旧时天津主要的江西瓷商

乐盛大

乐盛大开业于1847年之前。档案记载其在1907年自述:“自换房东为王姓已六十余年”。店铺位于锅店街,铺东为江西抚州人乐绍卿。1903年,乐绍卿被天津知府凌福彭任命为天津商务公所瓷行行董。1905年,乐盛大加入天津商务总会。乐盛大的铺面系租用盐商王锡瑛铺房,1907年因营业困难拖欠房租被王锡瑛控告,经营陷入困境,乐绍卿不得不南下变卖家产以补缴欠租。至1908年初,乐盛大已是员工星散,仅剩一名学徒,不得不腾房歇业,通过变卖景德镇产业偿还债务,从此退出天津市场。

瑞昌祥

瑞昌祥成立于1882年,铺东为江西抚州人傅祯卿,铺掌为江西人冯祖荫(字拱宸),位于估衣街。1900年庚子事变中遭焚掠一空。为了避免火灾,在五彩胡同租明窖子一所作为栈房。瑞昌祥在1905年至1906年间加入天津商务总会,1908年向天津商务总会报告其经营状况是“每年至多作三两万流水”,因市面冷淡,不能获利,亏累已深。1909年,冯祖荫被江西瓷商推选为天津总商会行董。1925年店铺遭抢劫,影响经营。1931年《天津市磁器业调查》显示,其资本为8000元,全年流水达5万元,盈利三千余元,营业状况在天津瓷器店中算是比较好的。

协昌明

协昌明系抚州人上官桐(字曙云)于1897年接办原李均昌字号而设,上官桐兼任铺东、铺掌,位于估衣街西头路北。其前身李均昌约在清咸丰初年开业。1903年,上官桐被天津知府凌福彭任命为天津商务公所瓷行行董。协昌明在1905年加入天津商务总会,上官桐在1909年被江西瓷商推举为天津总商会行董。1912年壬子兵变中,协昌明遭受火灾,损失惨重,被迫停业半年。1915年,上官桐将协昌明更名为“新昌和”。1919,年新昌和作为江西瓷商代表之一向天津总商会呈交说帖请求取消码头捐。1922年,铺掌变为冀县人杨俊卿。1926年,天津的江西购货瓷商为请求减轻税捐,联名向天津总商会呈交请议书,署名名单里已经没有新昌和了。所以其结束经营当在1922年至1926年之间。

吴协兴

吴协兴创建时间不详,位于锅店街,铺东为抚州人吴永澂,铺掌唐绍濂籍贯不详。1900年天津锅店街大火,烧及该店。1903年,唐绍濂被天津知府凌福彭任命为天津商务公所瓷行行董。1905年至1906年吴协兴加入天津商务总会。根据1916年美国领事对天津各会馆的调查,江西会馆成员中仍有吴协兴,铺东为吴昆山。1921年《天津指南》列出了瓷器店39家,其中已经没有吴协兴,则其结束经营在1916至1921年间。

修盛魁

修盛魁成立时间不详。1905–1906年正式加入天津商会。铺掌先后为抚州人艾赞宸(字修予)和艾集祥。1909年,艾赞宸被推举为天津商务总会江西瓷商行董之一。1919年,修盛魁作为江西瓷商代表之一向天津总商会呈交说帖请求取消码头捐。1931年流水额度为7000元,连年亏损,勉强维持着经营。1936年12月,天津磁业同业公会会员中已经没有修盛魁了,则其结束经营于1931至1936年之间。

豫盛号

除了以上五家外,还有一家非抚州帮的江西帮瓷商豫盛公司也是较为重要的。这家公司全名“豫盛磁(瓷)器公司”,也称“豫盛号”,1905年成立,位于北马路杨家胡同口斜对过。经理人先后为邬竹斋、王逵生、徐润甫、徐榕亭、徐辅庭等,都是江西人,其股东徐德林也是江西籍。1915年,其12件瓷器在巴拿马赛会上获得金牌奖章。1921年曾遭遇火灾,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已经是连年亏损。1941年,经理徐辅庭曾申请歇业,此后由北方人经营,1949年8月该字号尚存。

源泰

源泰于1912年成立,位于侯家后。铺东不详,铺掌是江西人顾静轩(顾安)。1931年尚有15000元的年流水额度,为当时的较高水平,但1936年之前就已经结束了。

景华泰

景华泰成立于1917年,位于估衣街。铺东为崔景华,铺掌为杜景虞。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家瓷器店的经营状况一直不错,1931年流水达22000元,且保持着两三千元的利润。但是1937年,由于“市面不景气,货物滞销,略有亏损”,于1月12日宣布倒闭。